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上海文化与都市文学的发展与嬗变”(05JJDZH237)

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研究丛书



杨剑龙 主编
冉彬 著

上海出版业与
三十年代上海文学

Shangh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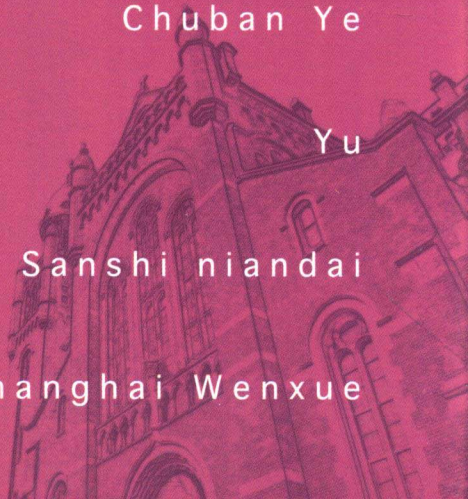
Chuban Ye

Yu

Sanshi niandai

Shanghai Wenxue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上海出版业与三十年代上海文学

冉彬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出版业与30年代上海文学/冉彬著. -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2

ISBN 978-7-80740-825-3

I. ①上… II. ①冉… III. ①出版业-关系-现代文学-研究-上海市 IV. ①G239.275.1②I209.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4593号

出版人

王刚

责任编辑

赵光敏

装帧设计

汤靖

书名

上海出版业与30年代上海文学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址: 上海绍兴路74号

网址: www.shwenyi.com

印刷

上海港东印刷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7.5

字数

206,000

版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80740-825-3/I·619

定价

28.00元

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T: 021-59671164

总 序

从文化与文学互动中研究上海文学

杨剑龙

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视为文学研究“方法论热”时期，域外的各种文学理论、研究方法被先后介绍进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几乎成为了文学研究新方法的演练场：英美新批评、原型批评、阐释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接受美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囫圇吞枣式地运用新观念新方法，成为当时文坛的一种现象。回眸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模仿多于创造，求新长于深入，形式大于内容，过程重于结论。虽然，当时学界诸多人士对于文坛的这种新概念新名词漫天飞的现象多有诟病，但是现在看来，倘若没有那时候的模仿与求新、形式与过程，我们的文学批评也许仍然会单纯延续传统的社会学、历史学、美学批评等方式，我们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也会止步不前。

在探究与追踪西方的文艺理论与批评方法中，新批评以文本为唯一的研究对象，原型批评从集体无意识关注原始意象，阐释学批评根据文本本身来了解文本，女性主义批评从颠覆男权争取女权角度观照文学等等，也

许人们看到文学研究又落入了相对狭窄的研究视阈。20世纪90年代，文化研究理论的引进与研究方法的兴盛，一定程度拓展了新批评、阐释学批评过于关注文学的内部研究而忽略文学外部研究的倾向，成为文本中心主义的某种反拨，在大众文化盛行、社会批判意识回归过程中，文化研究得到文学研究界广泛的认同和运用，文学研究拓展出一片新的天地。

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中指出：“上海，连同它在近百年来成长发展的格局，一直是现代中国的缩影……上海提供了那用以说明现代中国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新事物的钥匙。”（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页）由于上海飞速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由于上海在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要地位，上海一直受到世界的关注与研究，可以说已经构成了一门新兴学科——“上海学”。从文学发展的历史看，上海重要的历史地位与影响毋庸置疑，世界上新的文学理论、文学思潮、文学作品大多通过上海引进中国，上海也成为追随世界文学潮流运用新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方式进行文学创作的实验场，从而逐渐影响到中国文学的嬗变与发展。

对于上海文学的关注与研究，历来成为中国20世纪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从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美学角度展开对于上海文学的研究，呈现出文学外部研究的某些缺憾；从新批评、阐释学、结构主义批评等方式展开对于上海文学的研究，又呈现出文学内部研究的某些不足。文学的文化研究在某种方面弥补了某些不足，虽然文化研究在总体上仍然是文学的外部研究，但是倘若我们结合文学的内部研究的方法，可以弥补如上某些缺憾。

人们在阐释文学的文化研究时，往往强调文化与文学的互动：用文化学方法来研究文学，借助文本来研究文化。我们运用文化研究方法研究上海文学，也正在于文化与文学之间的互动，意在通过对于上海文化语境的分析，研究上海文学的发展与嬗变；通过对于上海文学发展与嬗变的研究，分析上海文化的内涵与特征等。采用文化研究方法研究上海文学，拓宽了我们研究的视阈，拓展了上海文学研究的境界。在运用文化研究方法过程中，我们仍然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运用其他有关的研究方法，使我们对于上海文学的研究更加切实和丰富。

“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研究丛书”共八部，分别为《文化巨匠鲁迅与上海文化》（梁伟峰）、《上海市民文化与现代通俗小说》（张登林）、《上海出版业与三十年代上海文学》（冉彬）、《都市风貌与海派气质——清末民初长篇都市小说与上海叙事》（吴智斌）、《世界潮流中的海派文化与海派小说》（林雪飞）、《上海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杨剑龙等）、《上海文化与上海唯美主义文学思潮》（赵鹏）、《都市上海的发展与上海文化的嬗变》（杨剑龙等）。该丛书的意义和价值大致有如下方面：1.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比较全面地研究了上海文学，深化与拓展了对于上海文学的研究，在研究视阈与研究方法上具有创新价值；2. 涉及通俗文学、海派小说、唯美主义文学、自由主义文学、左翼文学、清末民初小说等诸多方面的系统研究，丰富发展了对于上海文学的研究；3. 立足于从文化角度研究上海文学，尤其注重研究上海文学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深化与拓展了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研究。4. 该丛书在诸多方面都具有填补某些空白的价值与意义，对于深化上海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该丛书的论题有的是我给著者的，有的是著者自己设立、经我认可的，丛书中的每一部我都分别予以指导，不少著作是几易其稿，每部著作的字词句甚至标点符号我都作了修改。

“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研究丛书”获得了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的资助，获得了上海文化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致以我们真诚的敬意与谢意。

该丛书的研究视阈为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阔，必然有诸多缺憾与不足，敬请诸位行家指正赐教。

该丛书可以作为有关学者、研究生的参考书，也值得大学本科生、文学爱好者阅读。

是为序。

杨剑龙

2011年7月20日

于瞻雨楼

总序 / 0

导论 / 1

第一章 都市的发展与出版业的繁荣 / 15

第一节 都市的发展 / 15

第二节 出版业的繁荣 / 27

第二章 30年代上海出版业与文学的发展 / 59

第一节 30年代上海出版业的发展环境 / 59

第二节 30年代上海出版业的发展特点 / 74

第三节 30年代上海出版物的读者 / 92

第四节 30年代上海出版业与文学的发展 / 106

第三章 作家与出版 / 135

第一节 鲁迅 / 135

第二节 林语堂 / 150

第三节 赵家璧 / 168

第四节 邵洵美 / 181

第四章 30年代出版业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 196

第一节 文学的经典化与大众化 / 196

第二节 中外文学交流的强化 / 209

结语 / 222

参考文献重要参考书目 / 225

主要参考旧书、报刊 / 230

致谢 / 231

导 论

一、问题的提出和学术史综述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首次使用“场域”概念。他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空间里，总体的社会空间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小空间构成，这些小社会空间就构成不同的“场域”。“场域”即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还原文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文化场域的研究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兴趣，体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学者们试图通过考察文学与书籍报刊的生产、出版和发行的关系，来完整地还原现代文学生成的物质文化场域。报刊是最早刊载现代文学的媒体，学者们描述和还原现

^① 见[法]皮埃尔·布迪厄 华康德著：《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 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134页。

代文学生成场域的努力，往往从探讨现代文学和早期报刊的各种关系开始起步。现已出版的6本论文集集中体现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批评空间的开创：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①、《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②、《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③、《大众媒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④、《都市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⑤和《文人集团与中国现当代文学》^⑥。

《批评空间的开创：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收录的论文较早显示出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⑦论文集中有3篇直接以文学传播的媒介——杂志、出版社、报纸为研究对象，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把对传播媒介的分析提升到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层面，通过考察期刊编辑体制的运作、文学社团的作用、文学产品的生产方式，得出文学进程是可以人为设计的结论。李欧梵的《“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认为现代报纸是文人公开议政的“公共空间”，鲁迅将发表于《申报·自由谈》的杂感结集而成的《伪自由书》，就是鲁迅和新闻检察官捉语言迷藏而写的游戏文章。《申报·自由谈》副刊刊登游戏文章的功用就在于带动读者阅读兴趣，读者越有阅读兴趣，报纸越流行，其带来的结果既有商业上的利益，也有文化上的移风易俗。孟悦的论文《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与上海近代印刷文化的社会构成》以商务印书馆为个案，分析了构成印刷文化的两个方面——刊

① 王晓明主编，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② 陈平原 山口守主编，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

③ 刘增人等纂著，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④ 程光炜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关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王岳川认为有三个方面的转向：一是从经典文化转向了大众文化的研究，或从中心转向了边缘的研究；二是从文字载体的文化研究转向了影视、图像的现代文化研究，使广告、绘画、建筑、影视、大众传媒、消费文化成为热门话题；三是从纯文学研究转向种族、性别、阶级、民族性、差异性、社区文化、媒介文化、女性文化和后殖民文化等问题的审理。这种新型的学术研究类型，形成了性别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种族文化差异研究、当代影视文化研究、现代消费文化研究等多种新型研究的兴起。见王岳川著：《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34页。

器掌握者和读者各自的特点以及相互的关系。她首先分析商务印书馆机器掌握者的都市化过程，其次分析构成印刷文化的另一面——都市读者的阅读需求，结论是商务印书馆成功地从以印刷业为主转向以出版业为主，关键在于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发掘出了一批和自己的都市体验和经历相似的读者群。

论文集集中的其他论文也或多或少地侧重对文学传播手段的关注。如刘禾在《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一文中提出，“现代文学”这一概念应该把作家和文本以外的全部文学实践纳入视野，“民族国家文学”的范围除了创作和批评以外，还包括出版机构、文学社团、文学史的写作、经典的确立、统一评奖活动、大学研究部门有关学科和课程以及教材的规定。

陈平原主编的论文集《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中有几篇关于30年代文学与出版关系研究的论文。魏泉的《旧文人：现代文学中的另类存在——〈青鹤〉研究》，依据30年代专登旧文人创作的杂志《青鹤》半月刊提供的史料，来触摸30年代上海旧文人的生活方式、文化心态和创作风格。孙玉石的《〈现代〉诗歌的历史定位与艺术探索》，通过对在《现代》杂志上发表诗歌的诗人及作品进行细致分析，指出《现代》杂志在30年代现代派诗潮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戴望舒“诗坛首领”地位的确立与施蛰存用《现代》杂志大力推荐关系极大。葛飞的《中国新感觉派小说与现代派诗歌的互动与“共生”——以〈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为中心》，将文学期刊看成是一种具有自我“再生产”功能的“文学生态环境”，在文学期刊形成的“文学生态环境”中，小说和诗歌有共生互动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首次以116万字的规模集中推出了关于现代文学期刊的研究成果。该书分上、中、下三编。在“上编”中作者详细地梳理和评价了前人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研究成果，在“中编”中作者用“个案考察”的方式分析了现代文学期刊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如通过考察《现代》月刊，作者认为《现代》既同情左翼，又钟情于现代主义，这使《现代》一扫同人刊物的单一价值观念，开辟了包容各种不同声音的“准公共空间”，在30年代营造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坛盛景。作者还在分析了《现代》杂志等个案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引人注

目的新观点：由文学期刊参与的现代文学已经不仅是抽象的符号系统，而且也是与一定的物质材料和技术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具体物化态的文化产业，是政治倾向、文学理念与经济效益动态平衡的产物，作者将整个现代文学看成是文化产业的一种，这种观点丰富了对现代文学的认识。“下编”占全书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主要内容是以“史料汇编”的方式辑录了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叙录与期刊研究资料目录，所以杨剑龙教授评价该书说：“丰富翔实的史料使该著具有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工具书的意义”^①。

程光炜在为其主编的三本论文集《大众媒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都市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人集团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所写的序言中谈到，文化研究源于20世纪70年代英国伯明翰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文化研究在80年代末成为美国的一门显学，90年代初登陆中国，深刻影响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大众媒介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渗透和影响，是当前文化研究的重中之重；文人集团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是另一个研究关注焦点；都市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是研究界兴起的又一个热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30年代文学与出版关系的研究，呈现出几大特征：

第一、在这支研究队伍中，主要还是由学文学出身的学者们构成，但是一个新的趋向是大量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也加入了这个队伍，这些从事跨学科研究的学者有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大众传播学和历史学等相关专业学科背景，他们的加入使文学和出版关系研究增加了强烈的跨学科色彩。研究者有意识地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文化史学、大众传播学、心理学和哲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文学问题，显示出了新颖的认识文学问题的角度。如王富仁的论文《传播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用传播学的眼光观照30年代文学刊物，提出文化传播媒体就其社会作用

^① 杨剑龙：《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重要收获——读〈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文汇报·读书周报》2006年2月17日。

而言是传播文化，但自身的存在基础则依靠经济。^① 政治或者给以经济的资助，或者禁止其发行，断绝其经济的来源。在政治、经济、文化三种不同力量的冲突格局中，媒体有三种不同的选择方式，选择一种力量可能要牺牲另外一种或两种力量。如要保证经济上的高利润，就须迎合经济领域和广大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鸳鸯蝴蝶派文学杂志坚持的就是这样一种办刊方针；要想置于政治权力的保护之下，用文学的手段实现政治宣传的目标，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的文学杂志走的就是这样一条文化道路；要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新文学的精神价值，不但会失去国家政治的有效保护，时时准备承担政治上的压力，还必须克服自身的经济困难，《前哨》、《申报·自由谈》走的就是这样的独木桥。不过，更多的文学传播媒体走的不是这样一些极端道路，但在它们内部同样汇集着这三种不同的力量，这三种力量不断寻求平衡就构成了传媒内部的张力关系。此外，费勇和吴燕合撰的论文《大众传播与文学功能的重新审视》也运用了大众传播学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传播的功能，并提出了文学传播学的概念^②。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公共空间”理论、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文学场”学说及加拿大传媒学者麦克卢汉“理解媒介”理论，是学者们用来分析文学和出版关系时常用的理论工具。如李欧梵的论文《“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和许纪霖的论文《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都运用了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空间”理论^③。孟悦的论文《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与上海近代印刷文化的社会构成》运用了布迪厄“文学场”学说和都市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第二、既有对现代文学和各种媒介如报纸、期刊或出版社关系的个案研究，也有试图从一些独特角度综合研究文学和整个出版业关系的专著和论文。个案研究中有单个出版社和现代文学关系研究，如《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文学》^④，也有单个作家和出版社关系研究，如《巴金与文化

① 见《读书》2004年第5期。

② 见《文艺争鸣》2004年第4期。

③ 见《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④ 孙晶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生活出版社》^①。贯穿《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文学》全书的一个核心概念是“知识分子岗位意识”，孙晶认为：出版工作者的知识分子岗位意识，在文化生活出版社背后起支撑作用。《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书则肯定了巴金、吴朗西等几个文化人组建的文生社对新文学新文化发展的贡献。

还有对某个期刊和30年代文学关系的研究，如对《现代》杂志和30年代文学关系研究比较早的研究成果有刘俊《论〈现代〉中的“新感觉派”小说》^②、马以鑫《〈现代〉杂志与现代派文学》^③和《〈现代〉：都市的节奏与都市文学的表现》^④。到2002—2003年又出现了好几篇论文，张永胜的《试论〈现代〉杂志作者群的构成特点》分析了《现代》杂志核心作者群的形成如何决定了这一杂志的风格，并以诗歌和小说为例论述它的综合性、开放性特征^⑤。张生的《从施蛰存的编辑理念看〈现代〉杂志的特征》则单从施蛰存的编辑理念入手来分析《现代》特色，如它在30年代初异常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所保持的中立态度、它对外国文学的同步跟踪和大力译介、它在栏目设置上的灵活性、它和作者及读者之间的活跃互动等等^⑥。易文翔的《试论〈现代〉杂志的文学共生性》揭示了《现代》杂志因以商业利润为目的推行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而导致的多种文学流派、文学样式共生的现象，认为《现代》为30年代上海文坛的多样与繁华提供了最好的注脚^⑦。宋琼英《疏离文学的政治功利化——论〈现代〉与施蛰存的文艺态度》认为30年代初左翼作家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以《现代》为阵地的论争，不是在文学的本体论意义上进行的，而多纠缠于文学和社会政治的关系问题，施蛰存作为《现代》的主编和一个有独特审美追求的作家，以文学理性顽强抵御着现实政治的巨大

① 李济生编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② 《苏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③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

④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⑤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⑥ 《文艺争鸣》2002年第2期。

⑦ 《河北学刊》2002年第3期。

诱惑，在现代文学史上保持了一份难得的清醒^①。任芳萍的《“一个综合性的、百家争鸣的万华镜”——论〈现代〉的编辑策略与范式》也注意到了编辑策略对杂志特色的形成所具有的影响^②。以上这些研究《现代》杂志的论文在材料的选取上各有特色，但对《现代》杂志特色的认定却几乎一致。

关于30年代报刊和30年代文学的关系，鲁湘元认为《申报》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和报刊文学史上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它开创了报刊文学的先河，确立了报刊文学的商品机制，它是报刊文学公众化、大众化的先锋，它首创了稿酬社会契约，同时《申报·自由谈》还广泛团结了众多作家。^③关家铮的论文《赵景深先生主编的“沪字号”〈俗文学〉周刊》从编辑思想、刊载内容、产生的影响等方面对《神州日报·俗文学》周刊、《大晚报·通俗文学》周刊和上海《中央日报·俗文学》周刊作了介绍，为俗文学研究学术史提供了资料。^④赖斯捷的《略论报刊出版对鲁迅杂文创作的影响》就报刊出版对改变杂文的地位、促进杂文的社会化所起的作用和如何从报刊角度评价鲁迅杂文的价值等问题展开了讨论。^⑤

在众多个案研究积累的基础上，综合研究也开始出现了。李欧梵的专著《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从都市文化研究角度综合考察了30年代上海印刷出版文化和30年代上海文学的关系，李欧梵作为海外学者对上海的兴趣以及身处海外回望和观察上海的视角，使他的研究具有独特的视角和新颖的观点。^⑥李欧梵和王德威两人都认为文化研究可以运用合理想象。吴福辉的论文《作为文学（商品）生产的海

①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②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③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2期。

④ 《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1期。

⑤ 《中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

⑥ 海外学者对上海城市进行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成果非常繁富。据不完全统计，到2002年，海外学者研究上海的英文博士论文就有323篇，著作230本，论文256篇。统计数据来自熊月之、周武主编：《海外上海学·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派期刊》集中研究了30年代上海文学与报刊出版的关系。^①他认为海派期刊的编辑方针和技巧受商业运作牵制，小说内容与时事联动，新潮是首要条件，期刊文字与图片互相映衬就是出于吸引读者的需要。受消费文化左右，海派期刊或者走创新路线，如《现代》，举凡最新文论、国内文艺论战、国外最新潮流、照片、插图资料等皆包括在其中。或者走普及路线，如《小说》，企图把新潮推广到普及的层面，制造出一种大众色彩。海派报刊大规模地培植了小说家。如小说家包天笑为《时报》记者，周瘦鹃为《礼拜六》杂志编辑。海派作家依赖报刊生存，他们把小说卖给报刊先行发表，或自编刊物推销作品都是很自然的事。旷新年的论文《1928年的文学生产》^②从文化人在30年代向上海的聚集、杂志与现代文学的生产和新书业与现代文学的生产三方面，说明了无论是通俗文学还是先锋文学都是现代文学生产的结果。甲鲁平的《从文学广告看中国现代文学期刊》^③认为从文学广告去探寻现代文学期刊及现代文学发展的信息，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手段。从文学广告中可以见出文学期刊的方方面面：它的信息交流意识与传播意识、它的政治倾向、它在特定时段的热点、它在文化市场中运作的状况等等。

第三、由于30年代文学生产和传播的中心往往在大都市，所以随着对报纸、期刊等出版发行研究的深入，就相应地提出了建立和发展都市文化研究的迫切要求。许纪霖的论文《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④通过分析都市的空间网络、近代中国两种不同形态的公共领域、都市知识分子的身份演化、自我认同和内在紧张、知识分子共同体和公共交往，详细讨论了知识分子与都市空间的关系。许纪霖指出，现代知识分子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正是通过具体的都市公共空间实现相互的交往和自我认同。这些空间主要指的是茶馆、咖啡馆、沙龙、书店、社团、同人刊物、公共媒体、出版社、大学和广场等等。

①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1期。

② 《读书》1997年第9期。

③ 《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④ 《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程光炜主编的《都市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集中收录了从都市文化精神、大学文学教育、出版文化以及文化产业等角度分析文学和都市文化关系的论文。其中李今的文章《上海新型文化人与出版业》指出：30年代上海新型知识分子事实上和新兴职员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吻合，他们首先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大众传播媒介报纸刊物的雇佣者，是随着报刊出版业的发展不断集结成群的。李楠的《于现代市民文化中安身立命——论上海小报的文化定位、生存境遇和策略》，从她阅读的七十多种小报出发，研究小报和鸳鸯蝴蝶派、海派文学的关系，肯定了范伯群先生对鸳鸯蝴蝶派文学和吴福辉对海派文学所下定义的合理性，同时肯定了小报是近现代市民社会中产生的文化标本。叶桐的《新文学传播中的开明书店》考察了开明书店的新文学出版物状况，指出新文学的“现代性”决定了必须通过现代文学教育与文学传播，培养出在文化教养、思想观念和语言上与新文学有着共同性的现代读者，开明书店的工作正是在这点上显示出它的意义。杨扬的《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学》提出商务印书馆开创的现代文化产业为20世纪中国文化、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王中忱的《新式印刷、租界都市与近代出版资本的形成——商务印书馆创立的前前后后》从都市文化中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经济实力等角度来揭示现代文学生成的物质性场域。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30年代出版业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成果大体可以归为四类：一是对报纸杂志本身进行观照并进行整体性研究，一改过去文学史往往只关注报纸杂志上的文本创作的偏向；二是将报刊与流派联系在一起进行探讨，有关《现代》与现代派关系是研究的一个热点；三是从报纸杂志的某一特色栏目、某一特殊现象等对杂志进行聚焦式研究；四是从文学与出版双向共生的角度进行观照，这是一种新的研究角度。上述四类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或者致力于对与文学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些编辑出版要素进行重点研究，或者从其他相关学科提供的理论和方法找到新的研究视角，这种文学研究新趋向有利于对文学特质认识的深化，也有利于对影响现代文学发展的外部诸因素进行全面认识。对现代文学的生成和发展来说，直接对它发生影响的因素就是现代出版业，不管是进行文